

李光耀的新加坡—— 意外的國家與絕對的生存^{*}

范盛保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摘要

這篇論文用建構主義的概念來分析新加坡意外的建國與追求絕對的生存之道。每一個國家獲得國家地位的方式不盡相同，每一個國家的生存之道也自然不同。國家所屬的全球或者國內環境的文化或者制度因素塑造了國家的認同。位處馬來海洋中的島國新加坡如何在脆弱性中維持國家的生存是本論文所探討的主題。本論文先分析新加坡在獨立前的背景，獨立之際的國內外政治環境，接著論述獨立後的小國生存之道，借此反思台灣人應該清楚認知台灣立國的文化環境，時時警惕台灣為脆弱的國家，進而發展清晰的戰略以維持國家的永續生存。

關鍵詞：建構主義、均勢外交、國家安全

* 本論文原發表於 2017 年 5 月 27 日由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所舉辦之「小國立國之道」學術研討會。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鉅細靡遺、不厭其煩的給予各項建議。內文倘仍有疏漏缺失，絕對歸責作者本人。

壹、前言

二戰結束的前後，很難令人相信，一個獨特處境、人口稠密、沒有腹地、沒有天然資源、多元種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在未來的十多年內(1959)，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治邦。為了生存，1963年時新加坡連同當時的馬來亞聯合邦、沙巴、砂拉越共組成立馬來西亞聯邦，從而完全脫離英國統治。在與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在種族權利分配上意見不合後新加坡在1965年被逐出聯邦。亦很難令人相信，新加坡可以在以馬來人為中心點的地方自成一個華人國家而繼續存活。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雖然李光耀在1990年正式辭去總理職務，但仍擔任國務資政(Senior Minister)，維持其在政壇的影響力，並進而在2004年改任內閣導師(Minister Mentor)，一直到2011年5月14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最低得票率，李光耀才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任何職務，正式結束在政府內閣長達52年的生涯。新加坡從自治、獨立建國到國家生存、政府治理(包括維持國家工業敏捷度、確保優生原則的教育體系、對於華人社區人數的優勢掌控、維持可畏的軍隊)，此藍圖都在李光耀的手中完成(Rahim, 1999: 40)。李光耀被美國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冠上「亞洲季辛吉」的稱號(普雷特, 2011: 110)。新加坡這個「意外的國家」與「絕對的生存」之硬道理，都與李光耀息息相關。說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是李光耀思想與行動的體現，亦不為過。

貳、意外的國家

如果以當代定義之國家概念去檢視現存的約200個國家其過去400年的演變史，當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簽定逐漸形成主權國家的概念時，國家總數約為50個；此後一直到1800年國家增長的數目不多，約為57個；到了1900年時國家總數約為86個。二戰結束後增至104個，至今全世界國家總數仍持續增加，當今聯合國會員已達194個，尚未加入的有台灣、

科索夫、梵蒂岡、巴勒斯坦等國。要了解國家的存在以及國家的生存方式，一定要放在此國家所處的脈絡下去檢視。每個國家獲得國家的地位的方式不盡相同，有的經由託管後獲得獨立，有的經由戰爭或協談獲得獨立，而新加坡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他加入了馬來西亞聯邦，但僅僅二年卻又被迫離開聯邦。

再者，就影響每個國家的安全環境之理論架構而言，現實主義者當然是強調物質的國家利益，此理論完全契合新加坡的生存模式。但是，國家利益並不是存在某處等著現實主義所認定的「自私自利的理性行為體」去發現它們。相反的，利益的形成是某個社會互動所建構的結果（Katzenstein, 2009: 2）。毫無疑問的，國家和其他的政治行為體謀求物質性的利益以捍衛他們的安全，對分析國家安全舉足輕重。但是，除了物質能力外，是否有其它元素可以解釋國家安全的行為？單獨從物質力量的角度來看，與美國相比，加拿大和古巴的相對地位差不太多，但是，其中一個是美國的威脅，另一個則是美國的盟友，造成此結果不是「觀念」因素嗎（Jepperson, et al., 2009: 35）？筆者認同社會建構主義關於規範、認同與文化的核心觀點，亦即「國家環境的文化或者制度因素塑造了國家安全利益或者直接塑造了國家安全政策」、「國家所處的全球或者國內環境的文化或者制度因素塑造了國家的認同」、「國家認同的變化或者革新影響到國家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國家認同的結構影響到國家間諸如機制或者安全共同體這樣的規範性結構」（Jepperson, et al., 2009: 55）。爰上，建構主義關於規範、認同與文化的核心觀點將用於分析本論文。

新加坡的萊佛士爵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角色是公認開拓新加坡的先驅者，而這一切的開拓，其實都是為了貿易。181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委任萊佛士為南蘇門答臘的明古連（Benkulu）副總督。由於明古連地理位置不佳，商人們多不願到此進行貿易，經萊佛士多次建議後，東印度公司授權萊佛士在馬來半島的南端尋找一個新的據點。1819年2月萊佛士在馬來半島南端一個本屬柔佛王國的島嶼新加坡建立殖民地。當萊佛士在1819年2月升起英國國旗時，這時的新加坡大部分是沼澤叢林，人口極少。不過新加坡一直試圖淡化1819年以前馬來人的歷

史遺跡，新加坡的教育部長 Tay Eng Soon（鄭英順）甚至曾說，教導學生 1819 年以前的歷史，只是浪費學生腦袋中的記憶空間（Rahim, 1999: 46）。反思一下，台灣仍在教導學生號稱 5 千年的歷史地理文化，豈不亦是浪費學生腦袋中的記憶空間？萊佛士（Swinson, 2003: 26）說：

我終於實現我的諾言來到了新加坡，享受著踏上這古色古香之地帶給我的樂趣。此地有個優良的海港，我們站在馬來亞帝國的核心，和中國只有一個星期的船程，暹羅近在咫尺，我們的勢力包圍著馬六甲海峽，確保我們的船艦可以隨時隨地駛向中國。

由於此區是荷蘭勢力範圍，荷蘭對英國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一事非常不滿，為避免發生衝突，英國高官如檳榔嶼的英國總督班恩曼（John Alexander Bannerman，任期 1817-19 年）亦多次要求萊佛士從新加坡撤退。隨著新加坡的快速發展，以及更多英國官員認識到新加坡的位置重要性，英國政府最終決定繼續佔領新加坡。英荷兩國為避免開戰，遂商議重新劃分在馬來群島的勢力，促成 1824 年的『英荷條約』（*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或是 *Treaty of London*），劃分兩國在印尼群島和馬來半島的勢力範圍。該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荷蘭國王同意其本人及其人民不在馬六甲半島任何地方設立建立物或與任何土著簽訂條約（第十條）、荷蘭國王撤回對英國國王之人民佔領新加坡島之反對、英國國王同意……不在新加坡海峽以南之其他島嶼設立建立物，英國當局亦不與那些島嶼之酋長簽訂條約（第十二條）（陳鴻瑜，2011：23-25）。在殖民時期這是常見的互不侵犯的利益劃分條約，英國取得馬六甲半島，而荷蘭取得新加坡以南，英、荷兩國各自取得所需的殖民地以利貿易進行。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並不是完全是物質性的，相反的，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和制度的，文化環境不僅影響到國家不同行為的誘因，也可以影響到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亦即認同）（Jepperson, et al., 2009: 34）。換言之，要了解新加坡的建國脈絡以及生存之道，採建構主義說法，就必須先從馬來半島（即西馬）文化環境說起。以李光耀在 1960 年代曾經說過的「馬來人僅在 700 年前才大規模移居到馬來西亞，有三分之

一是較晚近的移民」做為一個人口變化分析的依據，更晚近的清國大量移民是自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後所簽訂的『北京條約』（*Convention with Peking*），其中規定「容許外國商人招聘漢人至海外工作充當廉價勞工」（百度，2017）。彼時漢人的大量移民被視為是「暫時的勞動力」，賺了錢終究要回清國故鄉，當然更不可能是清國計畫性移民的擴張領土。而英國政府透過買辦制度對馬來半島所施行的行政管理，如英國高級專員克利福德爵士（Hugh Clifford）所說：「這是一個馬來人的國家，我們英國人來到這裡，是應他們的馬來統治者殿下的邀請，這是我們的責任，幫助馬來人統治自己的國家」（Wikipedia, 2017a）¹。

英國總是能找到美好的說詞，要幫助被殖民者學習政府自理，幫助馬來人統治自己的國家。確切來說，就是提供保護以換取貿易。對英國而言，馬來半島具備重要的橡膠和錫礦等經濟價值。然而，英國對馬來半島的強權統治，在二戰期間，當日本橫掃並占領東南亞國家時，白人的優越統治神話完全被日本摧滅。星島淪陷前日軍空投文宣（Swinson, 2003: 160-61）：

閣下鈞鑒：

本人，日本皇軍最高指揮官，秉諸日本武士精神，榮幸的向閣下呈上此函。建議閣下率馬來亞所有軍隊投降。

本人要向貴軍誠摯致敬。貴軍忠於大英帝國的傳統精神，正勇敢的保衛著如今孤立無援的新加坡城。閣下英勇的官兵，為維護英國戰士之榮譽，屢屢英勇奮戰。但是戰局之發展已確定了新加坡之命運，繼續無謂的抵抗只會對城內無數平民造成更直接的傷害，讓他們更陷於戰爭之悲慘和恐怖中，且對貴軍並不會帶來更多之光榮。

希望閣下接受本人之建議，放棄這無謂的負隅頑抗，立刻下命前線停止敵對，同時亦照此函結尾所述之步驟，派出閣下之談判代表。如果相反的閣下對本人之建議致之不理，繼續現有之抵抗，本人雖在人道考量上至為不忍，卻也不得不下令我軍向新加坡發動殲滅性

¹ 原文「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to] be 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Malay country, and we British came her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ir Highnesses the Malay Rulers, and it is our duty to help the Malays to rule their own country.」

攻擊。僅此再次向閣下致敬。

步驟 1 談判代表應赴武吉知馬之山路

步驟 2 談判代表應攜帶巨幅白旗及一面英國旗

日軍指揮官 山下奉文

當英國決定無條件投降後，英國代表向日軍：「關於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還有英、印、澳兵，你能保證嗎」？日軍回答：「能，你可對此事放心，我絕對保證他們的安全」。山下保證居民安全的承諾並未兌現，數百華人被載到新島東岸，被迫挖自己的墳，然後一排排遭掃射，之後更多的人被逮捕、殺害、失蹤。幸運的李光耀於此時逃過一劫（陳加昌，2016：25）：

日軍佔領新加坡初期，有一天我像其他數以千計的青年，在集中營受「檢證」。有一部分青年被送到另一邊，那是死路。我本能地覺得情形不對，於是要求看守的日本憲兵准我回家拿一些個人物品，非常幸運獲准。我從此一去不再回頭，「檢證」的事也就逃過去。由此刻起，日軍統治新加坡三年六個月！

依新加坡人口普查統計，在 1871 年時約莫有 10 萬人口，1900 年時約莫 23 萬，到 1931 年的 56 萬、1947 年的 94 萬及 1957 年 145 萬人口，華人人口所佔比率約莫是四分之三強。新加坡進入日本占領時期後，由於之前的新加坡義勇軍抗日以及新加坡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日軍對新加坡抗日的華人進行了許多報復和整肅，從 1942 年 2 月 18 日至 25 日進行肅清。日本官方的華人傷亡人數數字是 5,000 人，新加坡華社（Singaporean Chinese Community）認為是 10 萬人。戰後的審訊中的證據提出的數字是約 25,000 人至 50,000 人左右。李光耀在接受探索頻道節目訪問時認為大概是 5 萬到 10 萬的年輕男性華人被殺；但接受在國家地理雜誌訪問時認為大概有 7 萬甚至到 9 萬的人被屠殺（Wikipedia, 2017b）。這段日本人 3 年半的殖民將李光耀帶入政治，如李光耀所說：「日本人從來不會知道，他們對像我們這樣一代人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他們確實造成我及和我同一代人

的決心，致力於爭取自由，擺脫外國人的奴役與統治」，這也是李光耀後來在新加坡光復後決心打倒英國殖民主義者爭取獨立自主的原因（陳加昌，2016：26）。

在二戰結束之前，英屬馬來亞基本上包含三個政治群體，分別是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包括雪蘭莪、森美蘭、霹靂和彭亨，首府為吉隆坡，其外交和防務均由英國負責。在內政方面，除了涉及馬來習俗和伊斯蘭教的事務以外，四州均須聆聽英國派出的參政司的意見）、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馬來半島的 5 個馬來土邦的總稱，包括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和柔佛）以及海峽殖民地（英國於 1826 年至 1946 年對位於馬來半島三個重要港口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整合成一個管理機制），如圖 1。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017a)。

說明：馬來聯邦 (淺灰)、馬來屬邦 (淡黑)、海峽殖民地 (深黑)。

圖 1：1922 年英屬馬來亞

不似台灣人在二戰後結束了被日本的殖民統治，卻又「歡欣鼓舞」以「重回祖國懷抱」的心態迎接推翻前一個統治者（清國）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無奈的接受另一個政權的統治，殖民馬來半島 100 多年的英國重新回到馬來半島雖然有受到部分馬來人、新加坡人的歡迎，但是英國人的威信已大不如前，馬來半島人民逐漸有了政治覺醒。曾經是大英日不落國的光輝，卻令馬來半島落入日本殖民統治 3 年半，又有何資格重回到馬來半島統治？二戰結束後，英國殖民政府為整合英屬馬來亞，在馬來半島成立聯邦體制，屬英國皇家殖民地（由總督直接管治的殖民地），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於 1946 年 4 月 1 日由馬來聯邦、馬來屬邦以及海峽殖民地所組成（不包括新加坡）。這個聯邦體制主張放寬移民政策，減少馬來統治者的主權，不承認馬來人至上。本地出生的居民，大多數華人和印度人將依據聯邦的屬地主義原則而取得公民權。馬來亞聯邦的成立遭到了馬來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最後，馬來亞聯邦在 1948 年解散，重新組成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1948-57），並恢復馬來統治者原先象徵地位。馬來半島上的馬來人佔了人數的優勢，也順勢建構了此區以馬來人為主的規範與認同。表 1 顯示出馬來亞聯合邦成立之時的人口數，馬來人約莫多於華人 50 萬人。

當 1946 年 4 月 1 日馬來亞聯邦成立的同一天，新加坡亦成為另一個獨立的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保留了總督對於立法的否決和保留權，設立了有 6 個官方人員、4 個非官方人員所組成的顧問行政會議，以及一個官方佔多數的立法會議，並規劃在 1948 年舉行第一次普選（Yeo, 1973: 54-55）。從新加坡旗子左上角的英國旗幟（如圖 2）可以看出英國在此時對新加坡仍具主導權。

表 1：馬來亞聯合邦人口

年份	馬來人	華人	印度人	其他	總數
1948	2,457,014	1,928,965	536,646	64,802	4,987,427
1951	2,631,154	2,043,971	566,371	75,726	5,317,222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017b)。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017c)。

圖 2：新加坡旗子 (1946-59)

這樣的安排並無法讓當地人在公共事務上扮演一定角色。1948年3月新的憲法生效，新加坡開始有了選舉。在總數22席的立法議會中，僅有6席為直接選舉，由於投票者需先註冊，在當時94萬的人口中，只有英國臣民可以投票，合格選民有20萬，投票選民僅有1.4萬人。1948年的立法議會留影，除了總督外的22席議員，華人臉孔佔極少數（圖3）。到了1951年的選舉，議會總席次增加到25席，開放直選的席次增加到9席，註冊投票數增加到4.8萬，總投票數增加到2.5萬。由於仍無法滿足新加坡人參與政府治理的要求，1953年7月一個由9人組成的憲政委員會由林德爵士（George Rendel）領導，檢視新加坡的憲政地位。1954年2月委員會報告呈給新加坡總督尼高爵士（Sir John Fearn Nicoll），此報告主要的建議包括「組成立法會，且其中2/3由普選產生」、「選民身份自動生效，而非如以往選前登記」，而英國仍然控制內部、外部安全，並有權否決立法（History SG, 2017）。

1957年3月新加坡與英國達成協議，英國政府同意讓新加坡作為一個自治邦，在大英國協之內實行自治，英國負責新加坡的外部安全，至於內部安全則由英、新兩方共同負責。雙方同意讓新加坡有內部的完全自治，新加坡自治州應予成立，有其自己的公民。這些公民或是「出生在新加坡」，或是「出生在馬來亞聯邦」，或是「英國公民但有兩年居住事實」，或是「其它人種但有10年居住事實」。51席的立法會議員將會由普選選出，而總理將

負責除了國防及外交事務以外的所有事務 (Wikipedia, 2017c)。1959 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並舉行大選選舉第一屆完全民選的立法會的 51 名成員。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獲得 43 席，成為最大黨。新加坡最後一任總督顧德爵士 (Sir William Allmond Codrington Goode) 宣布新憲法生效，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他本人擔任首任元首，李光耀成為首任總理。



資料來源：History SG (2017)。

圖 3：1948 年新加坡立法議會

儘管新加坡在 1959 年已獲得自治，人民行動黨的領袖相信新加坡的未來是與馬來亞共存，他們認為新加坡與馬來亞在歷史的、經濟的關係非常強，而無法各自成為獨立的國家存在。在人民行動黨內部，親共勢力的華人則強烈反對新馬合併，擔心喪失影響力。而在吉隆坡的馬來亞政府，則是非常明確的反對共產主義。巫統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領袖原本對於合併是非常存疑的，一方面他們不相信人民行動黨這個政府，另一方面則是在新加坡的華人口數會改變新馬合併後的種族平衡。隨著新加坡政局不穩定，馬來亞首相東姑害怕新加坡有朝一日會被共產黨人占據，利用新加坡作為基地對馬來亞展開行動，1961 年 5 月 27 日，東姑公布想把新加坡、馬來亞、汶萊、砂拉越和北婆羅洲 (沙巴) 聯合起來組成聯邦 (Lee Kuan Yew 1998: 365)：

遲早馬來亞會與英國跟新加坡、北婆羅洲、汶萊、砂拉越達成了解，目前仍太早去判斷會達成何種共識。但是，我們應該往前看，將這些領土整合成關係更密切並在政治經濟領域上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目標²。

套用文前所引述建構主義者認為，「國家所處的全球或者國內環境的文化或者制度因素塑造了國家的認同」，此時並不存在「想像的新加坡國」，自治政府的李光耀在當時不認為新加坡適合獨立成為一個國家。人民行動黨支持合併，但是黨內親共人士怕合併會對他們不利，反對合併。李光耀這樣說³（Lee Kuan Yew 1998: 397）：

每個人都應該知道此聯邦對新加坡的重要性。它是生產橡膠與錫礦的腹地進而促使我們經濟繁榮，它是使新加坡成為資金流通城市的基地。沒有這些經濟基礎，新加坡將無法存活。沒有合併，沒有將此兩個政府與兩個經濟體整合，我們的經濟地位會慢慢的越變越糟，你們的生活會越來越糟。如果沒合併，這不會僅有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經濟發展，而是兩種經濟發展；如果沒合併，這個聯邦將會是跟新加坡競爭，在此情況下，兩者均輸。

李光耀決定在 1962 年 9 月 1 日舉行全民投票。選票上的選項，都是支持合併：或是「支持合併，新加坡獲得勞工、教育、電台電視廣播等事務上享有自主權，同時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或是「支持合

² 原文「sooner or latter Malaya should have an understanding with Britain and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North Borneo, Brunei and Sarawak. It is premature for me to say now how this closer understanding can be brought but it is inevitable that we should look ahead in this objective and think of a pan whereby these territories could be brought closer together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³ 原文「everyone knows the reason why the Federation is important to Singapore. It is the hinterland which produces the rubber and tin that keep our shop-window economy going. It is the base that mad Singapore the capital city. Without this economic base, Singapore w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merger, without a reunification of our two governments and an integration of our two economies, our economic position will slowly and steadily get worse. Your livelihood will get worse. Instead of there being one un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Malaya, there will be two. The Federation, instead of cooperating with Singapore, will compete against Singapore for industr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expansion. In the competition, both will suffer.」

併，但新加坡應以一州的地位，根據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文件，與其他十一州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合併」(就是在勞工、教育等事務上不享有自主權)。李光耀的建議贏得七成以上的支持，新加坡併入了馬來西亞聯邦(陳加昌，2016：154)。

在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種族問題是非常敏感的議題，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後的新加坡，在 1964 年的國會選舉中大敗，於是轉變訴求，指責中央政府歧視新加坡及非馬來公民，視他們為二等公民。他喊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針對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保障馬來人優先權而導致其他族群不公平，提出質疑。在馬來西亞此類多族裔國家裏，喊出此種口號等於是意圖削減馬來人地位，製造種族紛爭，導致馬來人和其他族群間衍生衝突以及緊張氣氛，最終導致新、馬分手(Lim, 2004: 129；陳加昌，2016：157-58)。

這個沒有喜悅的獨立宣言，與李光耀的淚水一起呈現李光耀(聯合晚報，2015/8/9)：

我讓馬來亞、沙巴、砂拉越的許多人失望，他們對於我喊出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做出了回應。

自由與獨立，永遠是人民的神聖權利。馬來西亞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是一個由馬來亞聯邦各州和沙巴、砂拉越以及新加坡，聯合組成的獨立自主國家。1965 年 8 月 7 日，馬來西亞政府跟新加坡政府雙方達成協議，同意新加坡不再是馬來西亞的一洲，新加坡也從此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簽署協議的雙方也同意，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後，馬來西亞政府從此放棄對新加坡所擁有的主權與司法權，而新加坡政府也將順理接管一切該等權限。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主、獨立與民主的國家，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裡，誓將永遠為人民大眾謀求幸福和快樂。

同一天上午，在新加坡以北 250 英里的吉隆坡，東姑正在向馬來西亞國會解釋：「我們最終發現，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對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領

袖採取鎮壓措施；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斷絕關係」。他說（人民網 2014/3/25）：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願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頌讚。余，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獲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批准，僅此昭示，自 1965 年 8 月 9 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州，它將永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邦國，從此脫離開不再依賴馬來西亞馬。馬來西亞政府承認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獨立自主的政府，並將本著友好的精神與之合作。

李光耀的政治口號，導致許多馬來政治人物要求中央政府逮捕李光耀並接管新加坡政府，李光耀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一旦發生被接管，人民行動黨將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成立流亡政府。在新、馬爭執的這段期間，新加坡隨時都有一名內閣部長留在國外，只要中央政府一出手，能逃出的閣員，立刻飛到金邊，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最後流亡政府沒有成立，但在新加坡宣布獨立的這一天，柬埔寨是第一個外交承認新加坡的國家（陳加昌，2016：157-58）。面對種種不利局勢，用李光耀的話來說，「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在我們的 200 萬人口當中，75%是華人，在居住著 1 億多馬來印尼穆斯林的 3 萬個島嶼的群島裡，200 萬華族人口簡直微不足道。就連我們的飲用水也來自柔佛州，在這樣一個敵對的環境裡，該怎麼生存下去」？

參、絕對的生存

再引前文：「國家環境的文化或者制度因素塑造了國家安全利益或者直接塑造了國家安全政策」。馬來海洋中的一個新的島嶼國新加坡，要如何面對從來不曾想過的「國家」安全？台灣在 1986 年反對黨成立之前，甚至在 2000 年政黨輪替資訊流通限制已逐漸減少之前，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都會編織一些社會要穩定、經濟要發展、國家要安定等理由，利用人民對未來無法預測的恐懼，要人民習慣於現有生活，要人們不要輕易的改變，這些台灣歷經的政黨謊言，一直被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善用而且發揮得淋漓盡

致。李光耀對於新加坡 52 年 (1959-90, 1990-2011) 的家長式統治以及對內政嚴格控制的程度，跟台灣自 1949 年起近 40 年被蔣家獨裁統治，其實是不相上下。不同的是，李家會創造出「亞洲價值」來合理化其一黨統治，而蔣家則是以「反攻大陸」合法化其一黨專政。

生存，是新加坡自 1965 年獨立後最重要的議題，在如何生存的過程中，李光耀不斷的強調「新加坡的脆弱性」，如李光耀所說：「新加坡是一個第一世界國家，卻將永遠保持脆弱。如同一棟建在軟泥地上的 80 層樓」(韓福光等，2013：19)。因為脆弱所以容不下政治異議，自然也成為人民行動黨壟斷政治和缺少政治競爭的藉口(韓福光等，2013：36)。李光耀完全不諱言的主張：「請問天底下有哪個政黨會扶持反對黨上台？我們為什麼不趁他們羽翼未豐就先剷除他們？否則，等他們站穩腳步，就很難除掉他們」(韓福光等，2013：75)。新加坡的脆弱性除了來自沒有天然資源、連飲用水都成問題外，還有多元種族社會結構的現實因素。當新加坡以華人居多的人口基礎宣布獨立，夾在穆斯林為主的兩大鄰國印、馬之間，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衝撞，就注定是新加坡穆斯林必須要面對的矛盾。倘若有一天與鄰國終須一戰，新加坡的穆斯林將陷入兩難困境：要選擇宗教認同或是國家認同？也因為多元種族的社會結構，新加坡在住宅政策上對於各種族入住有一定的比例安排以避免產生類似猶太人的聚居處 (ghetto) (Henderson 2012: 71)。新加坡連武裝部隊都必須準備兩套不同的食譜，其部隊的禱告詞都必須概括每一種宗教以尋求慰藉(韓福光等，2013：193-212)。

新加坡一直保持「均勢外交」，在大國(如美、中)之間採取均衡政策維護自己的安全，保障自己的利益。他與大國保持正常的對話和合作關係，但不與任一大國結成具有權利義務的同盟，以避免淪為附庸。李光耀始終強調，新加坡願意同所有的超級強國保持良好關係，並堅持不同不結盟的立場，絕不涉入任何衝突(匡導球，2015：180-82)。李光耀的名言：「大象打架，小草會遭殃；大象做愛，小草也會遭殃」；「鯊魚打架，會翻江倒海；鯊魚調情，也會翻江倒海」，正是各方不得罪的均勢外交策略(楊振宇等，2015：167-68)。

在此，筆者引用舊作（2013）〈小國大戰略－新加坡途徑〉來論述新加坡小國生存之道。筆者以為新加坡以四大支柱來保障其國家的生存，分別是「區域權力平衡」、「全面防衛」、「經濟戰略與主權基金」以及「亞洲價值與英語世界」。就「區域權力平衡」而言，由於自身地理條件限制，新加坡在安全上十分注重聯防自保，尋求集體安全。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把新加坡比作一條小魚，小魚要置身於魚群之中，靠結群來自保。用星國外交部長 Shunmugam Jayakumar 在 2004 年說的一段話最能描繪星國權力平衡的大戰略。他說：「星國不親美，不反任何國家，我們所做所為只親新加坡，所有外交政策以國家利益為考量，這些仍是我們的基本途徑。」（Tan, 2008: 27）。

新加坡全面防衛的概念共有五個層面，分別是軍事防衛、民事防衛、經濟防衛、社會防衛和心理防衛。而星國控制國營事業（或稱作政府聯繫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rporation，簡稱 GLC）則是其經濟大戰略的佈局，亦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政府聯繫公司主要受兩個國營的控股公司所持有，分別是新加坡的兩個主權基金，亦即 1974 年成立的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以及 1981 年成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operation，簡稱 GIC）。這兩個主權基金，一個對內，一個對外，雖運作標的不同，但管理的人都與李光耀家族成員有關，換言之，整個新加坡的經濟命脈與李光耀家族息息相關。

「亞洲價值」常是亞洲國家經濟快速成長或是合理化獨裁統治的說詞（Glazer, 1999: 27）。對李光耀而言，他認為東亞人的文化背景可以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核心價值，包括節約、努力工作、孝道、對家族的忠誠等。亞洲價值相信，個人因家庭存在而存在，社會優先於個人，和諧優先於論爭，既而推衍出政治的決策過程應交由專家而非經過普遍選舉（Jenco, 2013: 237, 250）。新加坡的菁英政治雖然有普遍選舉，但由於政黨控制嚴格，一直以來都是一黨獨大。Magnarella（2004: 179-80）歸納對普遍人權的四種批判，分別是共產主義的批判（認為普遍人權是資產階級對勞工階級的對抗）、社群主義的批判（認為過度自由的人權已經脫離自由主義的本質）、文化相對論的批判（認為在文化的脈絡下，人權並非普遍性，各個文化有

各自文化的發展），以及例外的的批判（認為自己應該是普遍人權的例外國家，主張他們的國家應該被視為特例以便讓他們的獨特文化傳統可以與和諧社會共存）。李光耀相當敵視民主制度，敵視西方普遍人權，乍看之下，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述幾乎囊括了 Magnarella 所歸納的四種對普遍人權的批判，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正是其合理化一黨專政的主要論述。

新加坡剛獨立時，非常害怕被認定為「第三個中國」，李光耀認為新加坡不是華人的國家、也不是馬來人的國家、印度人的國家或混種人的國家，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國家。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不分語言、不分文化，是所有有公民權的新加坡人的國家。李光耀很清楚新加坡的地理環境，四周都是排華國家，如果新加坡走華文沙文主義路線，就是死路一條。新加坡要生存，必須實行多元種族的政策，語言、宗教及教育一律平等（李光耀，2015：62-63）。1923 年出生在英國殖民地時代的李光耀，曾非常自豪地對專訪他的西方記者說「我唸英校，讀英文大學，看的是英文報刊雜誌。是用一對英國人的眼睛看世界」（大紀元，2005/05/19）。新加坡自 1959 年兩種語文政策(英語、華語)實施以來，到 1979 年，估計大約只有 3% 至 5% 的學生能夠有效的掌握兩種語言的聽、說、讀、寫，50% 至 60% 絕大多數的學生只能掌握一種語言，第二語言是達到勉強的水準。最後是約 30% 沒法升上中學只懂一種語文。至今，新加坡人的雙語文能力早已受世界肯定（李光耀，2015：183）。根據李光耀的總結，語言政策可以成為政治經濟成功的動力（李光耀，2015：323）。

肆、務實的李光耀與矛盾的李光耀

再回到建構主義的論點，國家作為行為者，受到規範、文化以及認同的影響。新加坡的文化環境引導出新加坡內部種種的規範，更造就出新加坡人對於國家安全以及生存的認同。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成功的故事取決於三大特性，確保這是個讓人們生活與工作的最安全國家；平等對待每一個公民；以及確保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續成功（李光耀，2016：17）。如果用李光耀的三個標準去判斷新加坡是否成功，答案是很明顯易見的。李光

耀的務實是小國的生存之道。李光耀自述：從英國人身上，學習到如何治理國家；在日本人身上，學習到如何利用權力。日本人佔領新加坡後，控制你的生死權，你必須服從，否則沒有食物。被逮捕、被虐待，全民變得唯唯諾諾。除了一些逃進森林採游擊方式抗爭的人外，一旦他們被捕，將被折磨。而李光耀在這種情境下生存下來（普雷特，2011：57）。為了要強化國防，李光耀展現出務實，新加坡政府邀請二戰時參與攻打新加坡的山下奉文司令部的參謀來新加坡，請教他們當年是如何打進新加坡（陳加昌，2016：17）：

當年一手協助山下奉文策劃攻佔馬來亞的山田一次中佐（中校），就在這一個內閣會議室裡，針對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所作所為向我致歉。1974 和 1975 年，他率領倖存的夥伴重返新加坡，向我們的武裝部隊軍人彙報當年日本進軍馬來亞的情況，以及怎麼一舉攻下新加坡。我告訴他，我們不能老是受歷史牽絆，必須往前看，消除雙方的疑慮。

然而，李光耀對於新加坡的成功與務實是帶有矛盾的。李光耀對新加坡的治國理念、態度，不是放諸四海皆同一標準。只准自己獨立，不准他人建國，這是其矛盾之一。新加坡的獨立建國，突破重重難關，但李光耀對於台灣維持獨立國家的態勢，卻是不以為然。他認為台灣與中國的重新統一，是時間的問題，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他認為台灣的國際命運早在 1943 年的開羅會議上就被確定了，他更認為經濟將會解決兩岸問題，逐步和不可阻擋的經濟整合，將把這兩個社會連結在一起。兩岸不斷發展的相互依賴關係，將使台灣無法實現獨立（李光耀，2016：45-46）。他的矛盾在於，或許他是想做一個獨特的華人國家，而容不下另一個華人的民主國家；或許是他未認清楚 1943 年的「開羅會議的決議」只不過是一個未被署名的新聞稿；或許是他幾近偏執的意識形態，專制獨斷的思想，從未問過人民需求，永遠只站在霸權的立場去思考霸權想要的結局。

李光耀相當敵視民主制度，他認為「民主制度並非靈丹妙藥，民主制度無法為所有人解決所有問題。中國若是民主國家就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中國或是印度社會有一些根本的勢力是難以改變的，那些歷史越是悠久

的越是如此」(李光耀, 2016: 165)。對於新加坡的政黨政治發展, 李光耀認為如果新加坡最終決定走向兩黨制, 新加坡將注定平庸。他認為兩黨制最大的問題是一旦落實, 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 參選得冒很大風險, 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 甚至卑鄙惡毒。他喜歡諷刺英美等兩黨制的國家, 只能有個平庸的政府, 國家一樣可以繼續發展, 而新加坡無法擁有平庸的政府, 因為他沒有任何資源(李光耀, 2016: 216-24)。這也是李光耀的矛盾之一。當他批判民主制度時, 卻忘了當初向英國政府爭取自治、選舉、當家作主的初衷; 當他批判兩黨制注定產生政府平庸時, 卻忘記當新加坡還在馬來西亞聯邦時, 他極力組織的馬來西亞團結總機構吸納了各地政黨並與東姑的巫統競爭; 當他批判選舉的卑鄙惡毒時, 他卻忘記從來只有他把對手告到破產、送進監獄。

如果說台灣要從新加坡的立國經驗, 可以學到什麼? 應該就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新加坡的好運是沒有敵國想要併吞它, 而台灣的鄰國卻是對台灣最具敵意。美國在臺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曾說: 「7成台灣年輕人相信, 如果中國武力犯台, 美國會出兵」。台海問題專家薩特(Robert Sutter)說: 「約8成台灣人認為, 如果台灣遭中國攻擊, 美國一定會來保護; 而實際上, 美國可能只有18%的人願意出兵護台」(中時電子報, 2017/5/8)。台灣人應該清楚的認知台灣立國的文化環境, 台灣是個非常脆弱的國家, 然而, 對美國的援助卻有不切實際的奢望。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 台灣當然必須選邊跟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民主、人權站在一起, 但是也不要忘記, 美國也一定要跟不自由、沒民主、缺人權的中國打交道。台灣人雖然已逐漸產生台灣認同, 也希望台灣自成一國, 但也必須知道, 中、美的和好與交惡都會波及台灣, 台灣應當要有更清晰的大戰略, 以維持國家的生存。

參考文獻

- 人民網，2014。〈李光耀終生抱憾：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3月25日（<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325/c372327-24728761-2.html>）（2017/5/1）
- 大紀元，2005。〈與李光耀較量（十四）追本溯源〉5月19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5/5/19/n926634.htm>）（2017/5/1）
- 中時電子報，2017。〈美日救台灣？日人：匪夷所思〉。5月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08000624-260309>）（2017/5/8）
- 匡導球，2015。《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台北：高寶國際。
- 百度百科，2017。〈北京條約〉（<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6%9D%A1%E7%BA%A6>）（2017/4/5）
- 李光耀，2015。《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雙語之路》。台北：時報文化。
- 李光耀，2016。《李光耀觀天下》。台北：遠見天下文化。
- 范盛保，2013。〈小國的大戰略—新加坡途徑〉收於施正鋒（編）《當代新加坡民主政治》頁221-44。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陳加昌，2016。《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台北：遠見天下文化。
- 陳鴻瑜，2011。《新加坡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普雷特，2011。《李光耀是狐狸？還是刺蝟？》。台北：聯經。
- 楊振宇等，2015。《學者談李光耀》。新加坡：八方文化。
- 維基百科，2017a。〈海峽殖民地〉（<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B3%A1%E6%AE%96%E6%B0%91%E5%9C%B0>）（2017/4/5）
- 維基百科，2017b。〈馬來亞聯合邦〉（<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亚联合邦>）（2017/4/5）
- 維基百科，2017c。〈新加坡國旗〉（<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加坡国旗>）（2017/4/5）
- 聯合晚報，2015。〈聽建國總理李光耀宣讀新加坡獨立宣言〉8月9日（<http://www.wanbao.com.sg/multimedia/vodcast/story20150809-61329>）（2017/5/1）
- 韓福光、朱萊達、蔡美芬、林惠敏、劉意慶、林悅忻、陳子敬，2013。《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台北：大地出版社。
- Glazer, Nathan. 1999. "Two Cheers for Asian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 No. 57, pp. 27-34.
- Henderson, Joan C. 2012. "Planning for Success: Singapore, the Model City-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2, pp. 69-83.

- History SG. 2017. "Rendel Commission Report Is Made Official."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21405a81-9376-4f6b-8200-47e62d0cbfc8>) (2017/4/1)
- Jepperson,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1996 (2009). 〈國家安全中規範、認同與文化〉(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收於 Katzenstein Peter J. 編 (宋偉、劉鐵娃等譯) 《國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規範與認同》(*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頁 34-76。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Jenco, Leigh. 2013. "Revisiting Asian Valu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4, No. 2, pp. 237-58.
- Lee, Kuan Yew. 1998.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 Lim, C. L. 2004. "Race, Multi-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4, pp. 117-49.
- Magnarella, Paul J. 2004. "Communist Chinese and Asian Values: Critiques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 21, No. 2, pp. 179-92.
- Rahim, Lily Zubaidah. 1999. "Singapore-Malaysia Relations: Deep-seated Tensions and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9, No. 1, pp. 38-55.
- Swinson, Arthur (李伯鷹譯), 2003。《新加坡淪陷：日軍入侵馬來亞》(*Defeat in Malaya: The Fall of Singapore*)。台北：星光。
- Tan, See Seng. "Riding the Chinese Dragon: Singapore's Prag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Jun Tsunekawa, ed. *The Rise of China: Response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pp. 21-45.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 Yeo, Kim Wah. 1973.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ikipedia. 2017a. "Ketuanan Melay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tuanan_Melayu) (2017/4/5)
- Wikipedia. 2017b. "Sook Ch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ok_Ching) (2017/4/5)
- Wikipedia. 2017c. "History of Singapo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ingapore) (2017/4/5)

Lee Kuan Yew's Singapore: Accidental State and Absolute Survival

Lloyd Sheng-Pao F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Kuan Shan University, Yongkang, Tainan,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constructivism to analyze Singapore's accidental founding of the nation and its pursuit of absolute survival. The way in which each country gains its national status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thus the ways for survival are naturally different. The cultural or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the global or domestic environment to which the country belongs shape the national identity. How Singapore, an island nation located in the Malay oceans maintaining the nation's survival in the context of vulnerabilit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Singapore's background before independence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independence. Then it discusses the survival of a small country after its independence. In this way, it reflects that Taiwan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aiwan's founding as a nation and be aware of Taiwan's fragile, and then develop a clear strategy to maintain the country's perpetual survival.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balanced diplomacy, national security

